

1805—2011 年埃及农产品市场化问题刍议

——以棉花的种植和销售为例

刘志华

(天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072)

摘要 采用历史分析法,以棉花的种植和销售为例,对 1805—2011 年埃及农产品市场化问题进行梳理。研究发现:1805—1952 年欧洲市场的棉花需求,其他地区特别是美国的棉花出口,世界市场的棉价波动,直接影响埃及棉花的种植和出口;现代化与殖民化错综交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对立统一,构成 1805—1952 年埃及农产品市场化的重要特征;1952—2011 年埃及播种结构与农产品贸易结构出现巨变;棉花产业日益没落和园艺产品渐趋重要,现代化与自主性相互强化,构成农产品市场化的鲜明特征。由此得出结论:农产品市场化系埃及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棉花种植与出口构成农产品市场化的重中之重;埃及农产品市场化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在各阶段农业剩余和农产品市场化的主要受益者也有所不同;政府政策、经营主体和国际市场是影响埃及农产品市场化的三大因素;农产品市场化与政治制度和国家主权关系密切。

关键词 农产品市场化;棉花;埃及;现代农业;农产品

中图分类号:F 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3)02-0038-09

现代化理论家布莱克指出,传统社会分工不明,因此劳动生产率低,多为简单小生产,商品交换规模小、不重要,人均收入停滞不前;现代社会分工较细,因此劳动生产率高,普遍采用扩大再生产,商品交换规模大、很重要,人均收入不断增长;经济现代化是从第一种状态向第二种状态转变的过程^[1]。正如布莱克所言,市场化程度的高低与劳动生产率、生产规模和人均收入密切相关,实乃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重要区别;而农产品市场化构成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从 1805 年穆罕默德·阿里就任埃及总督到 2011 年 2 月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埃及现代化启动并延续两个世纪。在此期间,农产品市场化系埃及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然而学界对埃及农产品市场化普遍着墨不多,且各种论述大多散见于中东史或埃及史专著之中^[2-10]。

在 1805 年穆罕默德·阿里上台前夕,埃及农业基本上自给自足,农产品市场化无从谈起。粮食作物长期主导着播种结构;尽管埃及开始出口短绒棉,但是外销棉花较少且品质低劣^[2]。政治动乱和闭塞状态成为农产品市场化的巨大障碍。阿里执掌政权之后,农产品市场化正式启动。在拿破仑战争结束

后,欧美棉纺织业迅速复苏,棉花在欧洲市场供不应求、价格上浮,于是阿里及其后继者开始极力提高棉花产量并扩大棉花出口。从 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 50 年代,欧洲市场的棉价上涨及埃及政府的产销政策,使埃及种植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棉花播种面积迅速扩大,产量大幅提高;贸易结构出现突变,棉花在出口商品中举足轻重。相比之下,1952—2011 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与园艺产业的发展,棉花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中的地位呈下降趋势,棉花不复成为国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棉纺织业则发展较快。总体而言,埃及现代化中的农产品市场化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在各个阶段农业剩余和农产品市场化的主要受益者也有所不同。因此,本文拟以棉花产销为例,梳理 1805—2011 年埃及现代化中的农产品市场化,探寻农产品市场化的历史线索。

一、1805—1952 年埃及的农产品市场化

1. 埃及农产品市场化的启动和单一作物经济的形成(1805—1882 年)

(1)1805—1848 年棉花种植异军突起与棉花专

收稿日期:2012-11-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研究”(12BSS01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中东政治现代化进程研究”(2009JJD770023)。

作者简介:刘志华(1983-),男,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现代化进程、“三农”问题。E-mail:liuzhuhua4593@126.com

卖制度的盛衰。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上台后极力推动和控制农产品市场化,以此扩大税源并强化国家权力。起初阿里极力控制谷物的种植和贸易。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欧洲粮食紧缺,谷价攀升。于是阿里着力扩大粮食生产和垄断粮食贸易。1811—1816年阿里相继禁止几乎所有粮食的私人交易^[7]。在1821年前,埃及的播种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但粮食市场化程度有所提高。同时阿里还推广种植亚麻、橄榄、葡萄、枣椰和刺槐^[11]。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美棉纺织业迅速发展,棉花供不应求,价格上浮。从1821年起,阿里转而极力提高棉花产量、扩大棉花出口和强化棉花专卖。为了提高棉花产量并促进棉花出口,阿里兴修水利、扩大耕地面积并提高复种指数;修建公路并开凿运河,便利农产品运输^[12];强化棉花专卖,以便榨取更多利润。一位英国观察家曾记录这一时期埃及大地主和小农在棉花销售中的不同境遇:“如果不是迫于帕夏的强制,农民不愿也很少会种植棉花。有钱有势的种植者能够保护自身免受政府税吏和其他代理人的榨取和欺骗,所以帕夏支付的棉价还比较划算;但是贫困小农完全在政府官员的掌控之下,他们的境遇往往非常悲惨而且遭受无情洗劫:通常他们在所收获的棉花品质较好时才能以正常价格出售棉花,在重量方面则受到欺骗……”^[13]欧洲市场上的棉价上涨与阿里的政策使埃及种植结构开始发生巨变,棉花播种面积迅速扩大,产量大幅提高;贸易结构出现突变,棉花在出口商品中举足轻重;政府通过控制棉花生产和垄断棉花贸易攫取大量财富。

总之,穆罕默德·阿里不仅直接征税,而且直接控制土地等生产资料,进而掌控农业生产、垄断农产品销售特别是操纵棉花出口、并且主宰农产品加工业。在这一时期,实行极权统治的埃及政府显然是农业剩余的主要获得者。

然而1838年《英土商约》规定:英国商人或其代理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购买并出口货物时,应交纳9%内地税和3%出口税,免交其他税收;帝国废除境内包括农产品在内的贸易垄断制度,严禁各省总督垄断当地各类物品的购买和运输,严惩推行垄断制度的维齐尔和其他官吏;条约适用于包括埃及在内的帝国各地^[14]。不久,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打败埃及,迫使阿里接受《英土商约》,埃及政府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的控制遭到削弱。

(2)1848—1882年棉花产销的急剧增长与英埃

两国的畸形贸易。在阿拔斯(1848—1854)时期,政府财政收入减少,而财政支出增加,出现财政困难;为此阿拔斯力图通过恢复贸易垄断制而重新控制农业剩余,但因遭到英国阻挠而失败。政府因投资铁路和援助奥斯曼帝国进行克里木战争而增加了财政支出;在1840年贸易垄断制崩溃后,欧洲商人转而通过埃及非穆斯林商人这一中介而收购小麦和棉花,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减少;1853年克里木战争爆发后,欧洲粮价上涨。于是1853—1854年阿拔斯开征新税,并严禁农民在收获前出售农产品,禁止出口谷物。然而,英国援引1838年《英土商约》和1840年《伦敦条约》关于禁止贸易垄断制的规定,迫使阿拔斯允许外国商人向埃及农民发放贷款,允许粮食出口,允许公开出售政府收购的全部棉花。不久阿拔斯的禁令形同空文^[15]。在阿拔斯时期,棉花产量和出口量继续上升。棉花产量从1850年的36.5万堪塔尔增至1855年的52.1万堪塔尔;出口额从1850年的230.2万埃镑增至1855年的459.1万埃镑^[16]。

1854年赛义德(1854—1863)上台,此时埃及国债100万埃镑^[17]。为弥补财政亏空,赛义德继续鼓励种植和出口棉花。然而在美国内战爆发前的1860年,埃及棉花出口量为5000万磅,仅相当于1861年东印度棉花出口量的1/4和1859—1860年美国棉花出口的1/5(1860年美国供应欧洲5/6和英国80%的棉花^[14]),大英帝国进口的棉花中不到5%来自埃及。因此,在美国内战爆发前,埃及还远非主要的棉花生产基地^[3]。

美国内战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在南北战争期间,美国棉花出口急剧减少,世界棉价陡增。1859年棉花价格为每堪塔尔12.25美元^[8],1861年10月利物浦棉价接近1860年均价的2倍,1862年10月棉花价格又翻了一番,1863—1864年7月棉价相当于美国内战前棉价的4倍多。大英帝国以及1857年成立于棉纺织工业中心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开始面临缺棉困境,迫切希望埃及增产棉花。英国棉花专家和“棉花供给协会”坚信,埃及是当时唯一最适合种植和出口棉花的地区。1861年7月棉花供应协会秘书兼曼彻斯特棉花公司代表海伍德在英国政府代表福布斯·沃森陪同下抵达埃及进行考察,主动提出将帮助赛义德与种植园主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提高单产并改良运输条件。海伍德离开埃及后,棉花供应协会将改良轧棉机运至埃及,向大

量棉农派发良种,并详解播种方法。1962年夏赛义德应邀访英,受到英国政府和棉花供应协会热情接待。在访英期间,赛义德向曼彻斯特棉纺织厂主保证,1863年的埃及棉花产量将超出历史最高水平50%。赛义德在回国后立即命令大地主将1/4地用来种植棉花;要求在棉花去籽、净化和打包过程中注意提高棉花品质^[3]。赛义德还将棉花出口税从10%降至1%以便鼓励出口^[14]。棉花的广泛种植使出口量从1861年的59.6万增至1863年的128.7万堪塔尔,棉花出口产值占全部出口产值的比重从1861年的不足40%增至1863年的约78%^[3]。埃及成为依靠棉花出口的单一作物经济国家。

1863年伊斯马仪上台。“当时正值美国内战期间,北方封锁南方海岸,英国人的棉花供应被切断。因此,英国人情愿不惜一切代价购买其他国家的棉花,以便保障兰开夏郡纺织厂的供应。对埃及棉花的旺盛需求,加速棉花出口,使埃及种棉者与政府均获利丰厚。在棉花繁荣期间,欧洲的投资银行家主动向伊斯马仪提供优惠贷款。”^[12]。为了扩大棉花播种面积,伊斯马仪开挖112条共8400英里水渠^[18],到1964年,下埃及扩大棉田100万费丹^[8]。棉花播种面积的提高有利于提高棉花产量与出口量。棉花出口量从1863年的128.7万堪塔尔增至1865年的250.7万堪塔尔,出口产值所占比重从1863年的不足78%增至1865年的90%以上^[3]。伴随着棉花收入的增长,1865年伊斯马仪所获税收高达15亿皮阿斯特^[3]。

然而,在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国际棉价开始暴跌。棉价从1864年8月的每磅30.75美元降至10月的21美元,1865—1866年在19美元上下浮动,1867年平均13美元并在1867年12月降至7.75美元^[14],到1870年跌至美国内战前的水平。埃及棉田被迫缩减,产量和出口量降幅约50%^[8]。直至1879年棉花出口量才恢复至223.2万堪塔尔^[7]。

总之,1848—1882年埃及农产品贸易垄断制的崩溃与土地的非国有化,增强了地主和国内外商人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的影响力。在控制农业生产方面,国内外商人向小农提供贷款与各种生产资料,进而控制其播种结构;在控制农产品销售方面,小农将谷物或棉花交予商人或村庄舍赫并由商人或村庄舍赫将产品售给出口公司,地主往往种植并轧棉,然后将轧好的棉花卖给商人、出口公司和欧洲棉

纺织厂^[2]。在这一时期,埃及棉花的产量,运输条件也有所改善,棉花出口量和占出口总值比重大大提高。国家政权无疑是这一时期农业市场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力,统治权力下降的埃及政府借此仍然获取大量农业剩余;但是,流向地主阶级、高利贷者、与欧洲和本国的商人的农业剩余呈上升趋势。

2. 英国占领之后埃及单一作物经济的固化(1882—1952年)

(1)1882—1922年棉花产销的继续扩大与单一作物经济的固化。1876年债台高筑的伊斯马仪被迫成立国债委员会;1878年埃及出现“欧洲人内阁”,财政收支受到英法的双重监督;1879年英法授意奥斯曼帝国苏丹废黜伊斯马仪;1882年英军扑灭奥拉比起义并占领埃及。埃及棉花在英国市场的比重上升,是英国强化对埃及的干涉并最终占领埃及的重要原因。在美国内战期间,埃及棉花在英国市场的地位从1854年的第15位升至1861年的第6位,并在1865年高居第3位^[14];埃及成为英国的重要棉花产地和投资场所。在美国内战结束后,美国棉纺织业大大发展,对棉花需求量上升,不仅导致棉花出口减少,而且开始与英国争夺世界棉纺织品市场。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地区棉花产量停滞不前。这2种情形深化了英国对棉花供应的忧虑。奥拉比起义爆发后,英国棉纺织工业担心大批农民因前往开罗和亚历山大建造和守卫工事而无人采摘即将成熟的棉花,摧毁埃及的棉花生产和出口,导致英国棉花匮乏价格猛涨,打击英国的棉纺织业;制皂厂则担心无法获得埃及的棉籽油;农场主则需要获得埃及的棉籽饼作为肥料。工商业界对埃及棉花及其副产品的需求促使英国占领埃及^[3]。

在1882—1922年英国统治埃及时期,英国极力提高埃及的棉花产量和出口量,力图使埃及继续成为英国的棉花产地和棉纺织品销售市场。英国驻开罗首任总领事克罗默宣称:“英国对埃及的政策,首先是要求埃及向英国出口棉花,然后再进口纺织品。因为埃及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生产是它的首要任务”^[9]。棉花的广泛种植需要大量水源和农业劳力;因此英国人重视兴修水利并废除徭役制度,以便保证农业用水和劳力的供应^[19]。棉花播种面积的扩展对其他作物特别是粮食作物的种植造成不利影响。1886—1913年甘蔗、蚕豆、大麦、小麦的播种面积普遍有所下降,而棉花播种面积却从86.6万费丹增至170万费丹^[7]。1897年8月至1912年3月年

棉花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从 22.04% 升至 32.62%^[4]。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在 19 世纪末呈上升势头,在 20 世纪初则迅速下降^[20]。棉花出口量在 1880 年为 300 万堪塔尔,从 1890 年起开始快速稳定增长,到 1914 年高达 737 万堪塔尔^[4]。1885—1913 年棉花和棉籽年出口额从 987.4 万埃镑增至 2 967.5 万埃镑^[7],棉花和棉籽出口总值所占比重在 19 世纪 80 年代超过 80%,1910—1914 年则超过 90%;棉布进口也相应增加^[8]。英国人在提高埃及棉花产量和出口量的同时,还强化对棉花种植和出口的控制。在一战期间,英商所操纵的棉花委员会和占领当局几乎控制所有棉花的种植和出口^[21]。1918 年占领当局规定棉花播种面积所占比重不得超过 1/3,以便增加粮食生产,保证协约国驻军所需;同年垄断棉花出口的外国公司以低于国际市场价 50% 的价格收购棉花,棉农损失 3200 万镑收益^[9]。

综上所述,在伊斯玛仪统治后期,英法利用埃及政府的债务危机而强化对埃及政治和财政的干预;到 1882 年,英国扑灭奥拉比革命并占领埃及。自此之后直到 1922 年英国承认埃及独立,英国政府凭借政治权力而直接操纵埃及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英国政府和商人攫取大部分农业剩余。

(2)1922—1952 年棉花产销的跌宕起伏与本土棉纺织业的艰难启动。1922 年英国政府承认埃及独立,1923 年埃及宪法颁布,埃及进入宪政时代(1922—1952 年),在形式上取得独立,英国的控制遭到削弱,大地主的政治经济影响不断扩大。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由此导致的棉价波动是影响埃及棉花播种面积的首要因素。棉花播种面积所占比重跌宕起伏,在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前夕最高,达到 37.53%,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的 1931—1932 年最低,降至 20.02%^[4]。这主要是由于 1931—1933 年国际棉价比 20 世纪 20 年代末下降 2/3^[15]。大地主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棉价即将下跌之际,极力推动政府出台法令,限制他人种棉面积或由政府购买和存储棉花,以便维持棉花价格^[5]。棉花播种面积波动与棉花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直接决定棉花产量的变化。从 1920—1924 年到 1950—1954 年,单位费丹棉花年产量从 3.67 堪塔尔升至 4.73 堪塔尔^[20]。棉花产量从 1922 年的 30.2 万 t 增至 1952 年的 44.6 万 t。埃及棉纺织业发展迅速,使国内棉花消费量上升,而棉纺织品占进口总值的比重大幅下降。棉纱产量从 1934 年的 1.1 万 t 增

至 1952 年的 5.6 万 t^[22]。棉纺织品占进口总值的比重从 1921 年 26.5% 降至 1952 年的 8.3%^[23]。棉花产量和棉纱产量是影响棉花出口量的重要因素。棉花出口量起伏很大,从 1922 年的 29.1 万 t 降到 1952 年的 27.0 万 t^[22]。棉花出口总值所占比重在 1910—1914 年超过 90%,到 30 年代则降至 70%^[8]。尽管如此,棉花依旧是埃及对外贸易和农业生产的支柱,棉花产值也逐渐取代地税而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5]。因此埃及经济极易受到国际棉价波动的影响。单一出口作物的经济模式在国际分工中居于劣势,工业化成为埃及发展民族经济的必由之路。

1922—1952 年埃及地税很低而地租很高,大土地所有制未受触动,政府无力控制棉花产销,导致绝大多数棉花中凝结的剩余价值主要流向地主和棉商之手。一般来说,亟需现金的小农会在收获前以相当于国际市场价 15%~20% 的价格把棉花预售给棉商,而不太亟需现金的小农则会在收获后将棉花以相当于国际市场价 35%~40% 的价格卖给棉商^[24]。在同一时期,英国对埃及的控制有所放松,而英国在埃及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不断衰落。从占领埃及到 1952 年,英国在埃及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呈现下降趋势。埃及进口的英国商品总额占埃及全部进口总额的比重,在 1922 年为 34%,到 1951 年降至 18%;英国进口的埃及商品总额占埃及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在 1922 年为 47%,到 1951 年降至 19%^[8]。伴随着人均耕地的不断下降和政党政治的兴起,地主阶级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化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这一进程直至 1952 年七月革命爆发和土改法出台才宣告中断。

二、1952—2011 年埃及的农产品市场化

1952—2011 年,棉花在埃及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中的地位呈现下降趋势。

1. 埃及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起伏较大

1952—2011 年,埃及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浮动较大。埃及农业部提供的数据显示,单位费丹的棉花产量从 1952 年的 4.53 增至 1970 年的 6.25 堪塔尔,到 1977 年则降至 5.60 堪塔尔^[4];到 1985 年恢复至 6.0 堪塔尔,到 2000 年增至 6.8 堪塔尔^[25];相关农业生产资料投入特别是农药、化肥、与种子的投入,棉虫和旱涝等自然灾害,构成影响埃及棉花单位

面积产量的主要因素。

2. 埃及棉花的播种面积所占比重大幅下降

1952—2011年,埃及棉花播种面积所占比重急剧下降。1950—1954年播种面积为941.2万费丹,其中棉花占18.8%^[26]。1960年播种面积为1040万费丹,其中棉田占190万费丹,约占18.3%^[5]。1970—1974年播种面积为1085.5万费丹,其中棉花占14.3%;1978—1981年种植面积为1109.2万费丹,其中棉花播种面积所占比重降至10.7%^[26]。从1985年到1992年棉花播种面积从108.1万费丹降至84万费丹,占全部播种面积的比重从9.67%降至6.72%^[27]。在20世纪90年代末仅有12%的耕地面积实行牧草—棉花轮种^[28]。2000—2011年穆巴拉克政权往往根据国际棉花价格的波动与国内棉纺织业的需求来确定棉花播种面积,但棉田面积依然在低水平上徘徊。

3. 棉价低位运行是棉花播种面积所占比重下降的重要原因

在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与穆巴拉克执政初期,棉花的国内售价主要受制于政府的规定。根据埃及中央价格署提供的数据,1960年每堪塔尔棉花的平均出口价和政府收购价分别为18.0和15.0埃镑,此后棉花的平均出口价与政府收购价均呈现上升趋势,到1970年分别为26.0和18.2埃镑^[29]。1976年皮棉平均出口价为40埃镑/t,而政府收购价仅为22埃镑/t^[30]。显然,2种价格的差距越拉越大。棉花收购价不高导致种植效益低下。1979年戴伯拉赫镇每费丹棉花的净收入仅有52.5埃镑(使用雇农的土地所有者)或106.5埃镑(自营的土地所有者),而同期每费丹牧草的净收入高达136.5埃镑,每费丹甘蔗的平均净收入为212.4埃镑。棉花收购价过低和由此导致的种植效益不高,迫使农户逃避政府与合作社的规定特别是逃避种植结构的规定。上埃及戴伯拉赫镇一位农民说:“我们为何应该早些种植棉花呢?棉花是政府的农作物。我们种植棉花仅仅是因为政府与合作社官员强迫我们这样做。”农民普遍不顾政府的命令,推迟棉花的种植日期。提前种植棉花虽然会使棉花增产,却不利于农民增收;推迟棉花种植日期尽管会增加棉虫害的发生几率,却能便利牧草收割。不仅如此,由于棉花售价太低,农民也缺乏在棉田除草施肥的积极性,而私自将合作社分配的棉药卖到黑市,进而获取现金^[24]。在20世纪80年代初东部省拜尔比斯区的2座村庄,较为贫

困、自有地产较少、地块数目较少、牲口较少、以及居住地距离农村自由集市较近的村民更倾向于违反政府在控制棉花地块分配方面的法规^[31-32]。穆巴拉克执政初期延续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农产品价格政策,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放宽对农产品的价格控制,棉花的国内售价逐渐取决于国际棉花价格波动与国内棉纺织业需求,但农民的种棉积极性仍然没有明显提高。

4. 埃及政府对棉花种植、运输和买卖的控制直接影响棉价水平

埃及政府的农产品价格政策与政府对农业生产、农产品运输和农产品贸易的控制紧密相关。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力图通过农业合作社而控制小农的生产过程,农产品的运输过程,以及棉花等重要农产品的贸易,进而转移农业剩余。

(1)控制农业生产过程。第一,控制种植结构。农业合作社必须依据埃及农业部的行政指令而实行2年或3年轮作制度即两圃制或三圃制^[33]。轮作制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第二,规定种植和收获的日期、采用的技术和储备容器。违反政府规定的种植结构或违反政府规定的种植和收获日期者,必须为每费丹播种面积缴纳20至50埃镑罚款^[31]。第三,提供贷款以及种子和农药等生产资料。在20世纪70年代,政府通过合作社给予棉农和蔗农的贷款数额差别很大。以上埃及米尼亚省戴伯拉赫镇为例,当地农民种植1费丹棉花仅能获得17埃镑农业贷款,而种植1费丹甘蔗却能获得45(在种植面积少于10费丹的情况下)甚至160埃镑(在种植面积超过10费丹的情况下)农业贷款^[24]。全部棉种由政府通过合作社售予农民。政府还向合作社提供受到补贴的农药。从1972年起,政府开始承担棉药的一半成本,并规定农民所承担的棉药成本上限;这就意味着一旦棉药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政府所承担的棉药成本将超过50%。因此政府对棉农的农药补贴从1974年的1920万埃镑增至1977年的3680万埃镑;同期农民每年只须为每费丹棉花负担13埃镑的棉药成本,其余均由政府负担^[34-35]。有时政府还组织劳力清除棉虫,这相当于变相提供免费农药^[36]。尽管如此,政府对农药的补贴数额远远不及对棉花的隐性征税。

(2)控制农产品的运输。政府对某些基本食品或棉花等用于出口的农产品实行定额强制运输,然后使前者进入政府的食品补贴系统,使后者进入出

口领域。违反政府的定额强制运输规定的农民将受到处罚。

(3)控制棉花等重要农产品的贸易。从1965年起,政府控制下的合作社垄断棉花收购,政府迅速取代棉商而成为主要中间人^[35]。村民基本丧失成为直接市场主体的核心权利。棉花平均出口价与政府收购价的差额构成政府的隐性征税额。政府对出口棉花的隐性征税额和税率在1974年分别为19 920万埃镑和82.6%,到1976年分别为6 200万埃镑和84.0%^[35]。1976年棉农以22埃镑/t的价格将原棉卖给政府,政府以15.2埃镑/t的价格将统购棉花售给棉纺厂,损失由政府财政承担。此后,纺纱厂向织布厂出售的棉纱价格以及织布厂向消费者出售的棉布价格都比较低廉,而同期国际市场上的原棉价格为40埃镑/t^[30]。因此棉农实际上在为国营企业和消费者提供补贴。由此可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政府通过生产资料与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得以隐蔽地向社员征收比直接税高得多的间接税,使农业剩余转移支付给市民、政府机关和工业领域。政府对棉花的统购包销严重挫伤棉农积极性^[32],导致棉花品质持续下降^[37]。棉花销售量也增长缓慢。从1965年起合作社售出的棉花量出现下降趋势^[29]。

5. 棉花产量增长乏力

1952—2011年埃及籽棉与皮棉的产量没有出现明显增加,而且时升时降。籽棉产量在1952年为129.8万t,到1971年升至141万t,到1976年降到107万t,到1980年再次上升至140万t,到1990年降至81.5万t,到1994年升至108.3万t,到1997年降至97.7万t。皮棉产量在1952年为44.6万t,降至1955年的33万t,升至1960年的48万t,到1965年达52万t,1970年降至50.9万t,1976年为40万t,然后升至1980年的53万t^[22,27,33,38]。2007—2008年皮棉产量仅有22.5万t^[39]。

6. 本土棉纺织业发展迅速

1952—2011年埃及棉纺织业发展较为快速。原棉消费量从1952年的6.8万t增至1970年的19.0万t,到1981年达33.2万t,在1993年为33.1万t。棉纱产量从1952年的5.6万t增至1970年的16.5万t,1981年的23.9万t,1993年的28.2万t^[22]。棉纺织品出口总额占出口总值的比重从1965年的14.0%降至1970年的16.7%,1981年的7.0%,1985年的4.9%,升至1990年的20.8%,

1995年的24.2%,继而降至2000年的10.3%^[40]。

7. 棉花产量增长乏力与本土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对棉花出口造成不利影响

棉花出口量在1952年为27.0万t,到1970年降至28.5万t,此后继续下降,1981年为17.8万t,1990年为3.9万t,1993年为1.5万t^[22]。此后数年棉花出口量仍然萎靡不振。埃及超长绒棉和长绒棉的出口量占世界同类商品出口量的比重,从20世纪30年代的75%降至70年代的30%~40%^[6],此后则继续下降。棉花出口总值占出口总值的比重,从1952年的80%^[41],降至1970年的49.1%,1981年的9.1%,1985年的7.0%,1990年的7.0%,到2000年仅有2.6%^[40]。世纪之交埃及棉花出口急剧下滑、棉花创汇大幅下降的原因在于:政府依旧控制棉花售价以便攫取农业剩余,从而挫伤棉农的生产积极性,迫使其种植价格控制程度较低的农作物;进城打工和出国务工的农村劳力增加,农业劳力发生短缺;苏丹和乌干达等国棉花种植和出口的兴起;人造纤维的发展所引发的替代效应;等等^[36]。

8. 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棉花产销的受益群体不同

1952—1970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立即着手实施土地改革,土改合作社的建立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在纳赛尔时代,埃及地税依旧很低,实际地租不断下降,小自耕农的土地私有权受到合作社体制的侵蚀,因此绝大多数农业剩余通过合作社的农产品统购包销体制转化为政府的实际财政收入,进而构成纳赛尔极权体制的重要经济基础,埃及政府再次成为农产品市场化的主要受益者。1970—1981年萨达特时代,地税有所上涨、但地租上涨更快,外国商人与本国地主对埃及乡村和农业的影响力逐渐上升,政府对乡村和农业的控制力有所削弱但是仍然不失为农业剩余的主要获得者。1981—2011年穆巴拉克时代特别是自1992年96号法颁布后,地租和地价急剧上涨,埃及地主、欧洲联盟、欧佩克、美国政府、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埃及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明显增强,政府不再成为农产品市场化的主要受益者,自由化迅速成为农产品市场化的发展趋势。

三、结论与启示

以棉花的种植和销售为例,对1805—2011年埃及农产品市场化问题进行历史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 政府政策、经营主体和国际市场是两百年来影响埃及农产品市场化启动与发展的三大因素

200 年来,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成本变化和供求关系,直接决定世界农产品价格,进而对埃及的播种面积和作物结构、出口数额和出口种类发生传导性影响,埃及农产品市场化正式启动。这是由于埃及农业已在西欧国家、埃及政府和经营主体三大力量的强力推动之下与世界经济发生对接,进而深受世界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制约。西欧国家亟需获得棉花等农产品,埃及政府极力开拓税源进而巩固统治,经营主体不断追逐农业利润;差异甚大的 3 种动机密切结合,从而构成农产品市场化特别是出口增长的深层社会基础。提高农业产量和满足市场需求,成为摆在经营主体面前的首要任务。提高农业产量的内在动力,迫使经营主体追加农业投资并改变经营方式,以便修建水利系统、扩大耕地面积和改进农业技术,提高土地生产率、资金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最终增加农业产量;满足市场需求的外部压力,则刺激经营主体适时调整播种结构。

然而埃及的农产品市场化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在各阶段农产品市场化的主要受益者有所不同。

2. 1805—1952 年埃及农产品的市场化:现代化与依附化交织

在 1952 年前,埃及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迟缓,经济现代化主要表现在农业领域。农业依旧构成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但棉花逐渐取代谷物而成长为首屈一指的农作物,棉花的出口是实现农业剩余的主要途径。总体而言,农产品市场化特别是棉花的种植和出口构成这一时期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欧洲市场的棉花需求、其他地区特别是美国的棉花出口、世界市场上的棉价波动,直接影响埃及棉花的种植和出口。一方面,埃及农业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日益加深,乡村的开放化程度持续提高,这是现代化的长足进步;然而另一方面,埃及日益成为以种植和出口棉花为主导的单一作物经济国家,逐渐沦为欧洲的棉花产地和商品市场,农业剩余主要流向欧洲,这意味着民族的苦痛与无奈;现代化与依附化的错综交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对立统一,构成 1805—1952 年埃及农产品市场化的重要特征。

3. 1952—2011 年埃及农产品的市场化:现代化与自主性并存

从 1952 年七月革命爆发到 2011 年 2 月穆巴拉克下台,埃及工业化取得长足进步,服务业有所发

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不仅如此,播种结构与农产品贸易结构也在政府政策、经营主体和国际市场的三重作用下出现巨变。棉花依旧构成最为重要的经济作物;然而棉花不仅迅速丧失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而且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出口中的地位也呈现江河日下的颓势。与棉花萎靡不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园艺作物栽培和产品出口自 1952 年以来特别是在穆巴拉克时代发展迅速,逐渐成为农业经济的新兴增长点与实现农业剩余的主要途径。棉花产业的日益没落和园艺产品的渐趋重要,现代化与自主性的相互强化,构成 1952 年至今埃及农产品市场化的鲜明特征。

4. 农产品市场化与政治制度和国家主权关系密切

在埃及现代化进程中,埃及农产品贸易垄断制度与极权政治具有共时性;极权政治构成农产品贸易垄断制度的政治前提,而农产品贸易垄断制度则成为极权政治的重要物质基础。不仅如此,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与中央集权衰落也呈现共时性。

国家主权与农产品市场化亦存在紧密关联。农产品市场化是一把双刃剑,其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主权能否得到较好的维护。由于农民的资金积累严重不足和技术力量非常薄弱,加之农业生产深受自然环境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影响,农民和农业在市场化进程中居于劣势,亟需国家权力的保护。在主权独立的情况下,农产品市场化无疑能够扩大城乡交往、密切内外联系、增加财政收入;然而在主权受到侵害时,农业财富流失、农民苦痛加深、殖民侵略加剧和中心—边缘体系强化,则成为农产品市场化的直接后果。

现代埃及的农产品市场化对我国农业市场化具有诸多重要启示:第一,农产品市场化依赖相对特殊的自然条件和规模消费的区位因素,生产大宗产品和发展现代农业应该因地制宜,气候土壤条件适宜地区、沿海沿边开放地区、大中城市郊区,在播种结构和农产品贸易结构方面不要追求面面俱到进而丧失区域特色。第二,农产品市场化耗资较大,应该通过优惠贷款和转移支付等手段,加大对棉花或园艺产业的融资力度,奠定这些产业发展的资金基础。第三,棉花与园艺作物的种植技术比较复杂,而现代园艺产业耗水较多,发展这类产业,只有继续推广农业技术,补齐农田水利建设短板,才能提升产品品质和产量。第四,棉花和园艺作物的采摘极其费工而

且产品不易储运,加快这类产业发展必须精心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着力改善运输条件,促进产品加工、运输和销售。第五,农产品市场化仰赖国内国外2种市场和2种资源,且农产品市场化的众多环节极易受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控制,有必要在发展外向型农业的同时,继续维护关税主权和控股能力,妥善处理与外国政府和经营主体的关税和贸易纠纷,确保我国政府和经营主体成为农产品市场化的主要受益者。

参 考 文 献

- [1] [美]C.E. 布莱克. 现代化的动力[M]. 段小光,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25-29.
- [2] BARBARA L. Rural marketing system of Egypt over the last three hundred years[J].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85, 27(3): 494-530.
- [3] EDWARD E. Egyptian cotton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26, 41(1): 523-545.
- [4] ALAN R. Egypt'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1800—1980[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 [5] ALAN R. Food, states and peasants: analyses of agrarian question in the Middle East[C].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6.
- [6] VICTOR L. The welfare and transfer effects of cotton price policies in Egypt, 1963-1978[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83, 65(3): 576-580.
- [7] ROGER O.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M]. London: Methuen Ltd, 1993.
- [8] CHARLES I.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 [9] 杨灏城. 埃及近代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10] 哈全安. 中东史: 610-2000[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
- [11] KENNETH C. The origins of private ownership of land in Egypt: a reappraisa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980, 12(3): 246-269.
- [12] ARTHUR G, LAWRENCE D.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M]. Eighth Edition. Boulder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 2006.
- [13] DANI R.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peasant political orientations in Egypt and Turkey[J]. *Comparative Politics*, 1982, 14(4): 417-442.
- [14] HERSHLAG Z. Introduction to the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M]. Leiden: E. J. Brill, 1964.
- [15] DALY M.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6] [埃及]拉西德·阿里·巴拉维, 穆罕默德·哈姆查·乌列士. 近代埃及的经济发展[M]. 枢原, 申威,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1957: 104.
- [17] GABRIEL B. A history of landownership in modern Egypt 1800-1950[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18] VATIKIOTIS P. The history of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Sadat[M]. London: Butler & Tanner Ltd, 1980.
- [19] ROBERT T. British agricultural and hydraulic policy in Egypt, 1882-1892[J]. *Agricultural History*, 1963, 37(2): 63-74.
- [20] SAMIR R. Capital formation in Egyptia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1882-1967[M]. London: Ithaca Press, 1974.
- [21] FARHAD K, JOHN W. Peasants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M].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1.
- [22] [英]B.R. 米切尔, 帕尔格雷. 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 1750—1993)[M]. 贺力平, 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 [23] ROBERT T. State, private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Egypt[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 [24] RICHARD A.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rural Egypt[M].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25] EL-GHONEMY M. Egyp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allenges for development[M].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 [26] SIMON C. the state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Egypt since 1973[M]. London: Ithaca Press, 1987.
- [27] RAY B.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Egypt[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9.
- [28] HANS L. Food,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C]. Oxford: Elsevier Science Ltd, 2003.
- [29] ABDEL M. Development,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rural Egypt, 1952-1970: a study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transi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 [30] ILIYA H. Subsidization policies in Egypt: neither economic growth nor distribu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992, 24(3): 418-495.
- [31] DYAA A, GARDNER B, RICHARD G. To violate or not violate the law: an example from Egyptian agriculture[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86, 68(1): 120-126.
- [32] NICHOLAS H. Agrarian transformation in Egypt[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7.
- [33] RAY B. Counter-revolution in Egypt's countryside: land and farmers in the Era of economic reform[M]. London: Zed Books Ltd, 2002.
- [34] RAY B. Politics, power and poverty: twenty years of agricultural reform and market liberalisation in Egypt[J].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07, 28(8): 1599-1615.
- [35] KARIMA K. The rural-urban income gap in Egypt and biased agricultural pricing policy[J]. *Social Problem*, 1981, 28(4): 422-426.
- [36] JAMES T. Rural workers and Egypt's national development[J].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994, 21(1): 38-56.
- [37] DOREEN W. Land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a study of Egypt, Syria and Iraq[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38] 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1950-1982)[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5: 83-84.

[39] 2007/2008 年度埃及棉花生产介绍——埃及代表团在 ICAC

第六十七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J]. 中国棉花, 2009(1): 46-47.

[40] KHALID I. The Egyptian economy, 1952-2000: performance, policies, and issues[M]. London: Routledge, 2006.

[41] WHEELLOCK K. Nasser's new Egypt[M]. New York: Praeger, 1960.

Commercialization of Egyptian Agricultural Products between 1805 and 2011

——A Case Study in Growth and Sales of Cotton

LIU Zhi-hua

(College of Marxism,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Abstract Based on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the case study in growth and sales of cott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Egyptian 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1805 to 2011. The result shows that from 1805 to 1952 the growth and export of Egyptian cotton was directly influenced by the demand for cotton in European market, by the export of cotton from other regions esp. the USA, and by the fluctuation of cotton price in global market. The interweaving of modernization and colonization as well as contradiction of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ere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1952 to 2011, Egypt's seed and trade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egan to show evident transformation. The cotton industry is gradually coming down and horticultural products is becoming more important, and modernization and independence are mutually strengthening, which constitutes th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Egyptian 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a word, 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aspects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Egypt, and the growth as well as export of cotton is the main indication of 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gyptian 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hows the obvious stage, and there are also different beneficiaries in each stage. State policies, agricultural subject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gyptian 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closely related to political system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Key words 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tton; Egypt; modern agriculture; produce

(责任编辑: 金会平)